

# 西夏的歷史與文化

李華瑞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東吳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lihr2002@163.com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 年）党項族在中國西部建立政權，自稱大夏國，或稱白高大夏國。同期及後來周邊北方民族又譯稱党項為唐古、唐兀或唐古特。遼、宋、金人因其在三朝的西部，多稱之為西夏，後世也多用此稱。“党項”之名，始見於《隋書》。党項族的族源現今大多數人認為是古代羌族的一支，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源自古代鮮卑族。在南北朝和隋朝之際，党項族分佈在現今青海東南部和西北部為中心的廣袤山林草原上。從事狩獵、畜牧業，俗尚武力，無法令，無徭役，不知稼穡。唐朝中期以後，迫於吐蕃族的強大勢力，逐漸內徙，遷往今甘肅東部和陝西北部一帶。唐末，党項拓跋氏參與鎮壓黃巢起義有功，其首領拓跋思恭被授為夏州節度使，復賜李姓，封夏國公，統轄夏、綏、銀、宥四州地方，治夏州。党項拓跋氏由此躋身於北方諸藩鎮之列。五代時期，夏州党項政權先後依附于中原的梁、唐、晉、漢、周各王朝，並在與鄰近藩鎮的縱橫捭闔的鬥爭中日益發展壯大，使得中央政權也不敢小視夏州李氏政權。

宋初，党項族首領臣屬宋朝。李繼捧弟繼元位，引發內部矛盾，遂向宋獻五州地。其族弟李繼遷反對宋朝直接接管夏州政權，公開抗宋自立。党項族在李繼遷的率領下，外附遼朝，內聯諸族，經過 15 年與宋拉鋸式的反復角逐，又重新佔據夏州政權的統轄區域，迫使宋朝封李繼遷為定難節度使。李繼遷死後，他的後繼者李德明，在宋遼關係緩和的形勢下，與遼、宋保持友好關係，繼續向西部

發展勢力。宋天禧四年（1020 年）將統治中心移往賀蘭山麓的懷遠鎮，改稱興州（今寧夏銀川），宋天聖六年（1028 年）佔據河西走廊。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 年）十月，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嗣位。元昊繼承夏國王位，是西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元昊具有雄才大略，提出“英雄之生當王霸”的主張；因此，元昊自承襲王位起，便有步驟、有目的開始了他的王霸事業。首先是改姓，將唐朝和宋朝賜給党項皇室的李姓和趙姓，改為党項姓嵬名氏，元昊自稱“兀卒”即表示自己為天子可汗之尊；其次是發佈剃髮的法令，令國人皆禿髮。



西夏男女服飾

再次是頒發了有關服飾的規定，凡文官武將、庶民百姓各有所服。而元昊本人衣白窄衫，氈冠紅果頂，冠後垂紅結綬，這是採用了吐蕃贊普和回鶻可汗的服制。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稱帝建大夏國，在給宋朝的表章中公開宣稱“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

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

至此，西夏轄境約相當於今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省的大部、陝西的北部、內蒙古自治區的西南部、青海省的東北部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蒙古國的一部分地區。成為當時能與宋、遼周旋、抗衡的第三大勢力。西夏從景宗元昊到末主昫共傳十帝，歷時190年。



西夏王陵

西夏是多民族國家，党項人為統治民族，但又聯合漢人、吐蕃人、回鶻人等上層，可稱是蕃漢聯合政治。皇族嵬名氏（兼用漢姓李）注意與党項的大姓通婚，后族“貴寵用事”，而皇權與后權，皇族與強宗大族之間也不時發生衝突。但西夏沒有建立像遼朝那樣的兩套官制，大體是效仿宋制，設立中央官制和地方的州縣制。

西夏巧妙地利用了遼朝與北宋的矛盾，爭取自身的獨立和生存，但主要的敵手是北宋，雙方進行了長期的戰爭。西夏最初處於攻勢，並且成為勝者。西夏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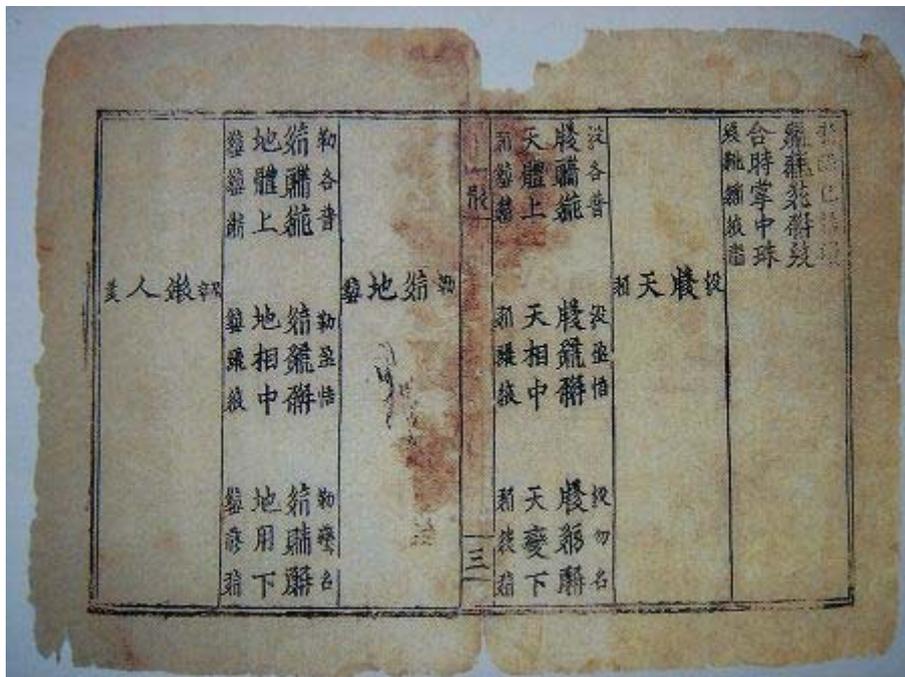
以騎兵為主力，但不善於攻城戰，故對宋只限於邊境殺掠。後來又不斷地被北宋攻城掠地，被動挨打，卻仍努力支撐困境。直到北宋末，南宋初，西夏利用金軍攻宋的機遇，奪取若干被占之地。此後與南宋隔絕，而與金朝基本維持和平。到夏金晚期，雙方都在蒙古的威脅下，仍然發生戰爭。西夏於寶義二年（1227年）亡於蒙古。史稱西夏“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徇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為異同焉。”



西夏文的創制。1036 年左右，元昊頒行党項文字，“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元昊主持創制的蕃書，即後來所稱的西夏文。元昊

尊蕃書為“國字”，使“藝文誥牒盡易蕃書”，並且用這種文字翻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書。翌年設立蕃、漢二字院，蕃字院掌管與吐蕃、回鶻一帶的往來文書，漢字院掌管與宋朝的往來表奏，中間寫漢字，旁邊寫西夏文。不到三十年西夏文就在西夏境內的法律條文、官署檔、審案記錄、買賣契約、文史書籍、字典辭書、碑刻銘文、印章、符牌、錢幣以及譯自漢文的儒家經典、史書、類書和兵書等典籍，得到廣泛使用和傳播。

為了便於學習本民族的文字，西夏中後期編撰了多種西夏語言文字方面的辭書。《音同》(又譯作《同音》)是一部以聲母分類的西夏文字典。這部字典共收六千多字。大致成書於西元1132年，是迄今現存最早的西夏字書。《文海》是一部兼有《說文解字》和《廣韻》特點的大型西夏文韻書；為了便於漢族人學習西夏文，西夏人還於1190年編寫了夏漢、漢夏雙解通俗語彙辭書《番漢合時掌中珠》。



《番漢合時掌中珠》

西夏文屬於表意性質的方塊字，直接借鑒漢字形體構造的“六書”(即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的造字方法，以會意合成和音意合成方式為主，

它的基本筆劃類似漢字“形體方整，類八分”，也有點、橫、豎、撇、捺、拐、提等。而且西夏文的書寫亦有楷書、行書、草書、篆書之分。在吸納漢文字造字方法的同時，又有党項民族獨特的構造方法，如筆劃較漢字繁複，撇、捺等斜筆教多，無豎鉤；象形字和指示字較少；會意字比漢字少，類似拼音構字法的反切上下合成則是西夏文構字的一大特點。

**独体字** (由基本文字原素直接构成,结构上无法再分解)

𠂇(人) 𠂈(禾) 𠂉(虫) 𠂊(一) 𠂋(半)  
𠂌(老) 𠂍(小) 𠂎(上) 𠂏(腰) 𠂐(皮)  
𠂑(带) 𠂒(梯) 𠂓(劳) 𠂔(女) 𠂕(圣)

**合体字**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基本文字原素组合而成,结构上可分解)

**合成造字法**

𠂖(水)+𠂗(土)合成𠂘(泥)

𠂙(心)+𠂚(恶)合成𠂛(害)

𠂜(齿)+𠂝(兽)合成𠂞(狼)

𠂟(木)+𠂠(雕)合成𠂡(凿)

西夏文的創制對西夏文教的興盛、佛教的傳播、文學的繁榮、印刷業的進步都有直接影響，可以說對整個西夏文化的進步有巨大的貢獻。

西夏的國家體制和統治方式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響。從李繼遷伊始至西夏末年，歷代西夏統治者都積極學習和摹仿宋朝，設官建制。李繼遷“潛設中官，盡異羌人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李德明時期“大輦方輿，鹵薄儀衛，一如中國制。”李元昊為建國更是摹仿宋朝建立一套官制，官分文武兩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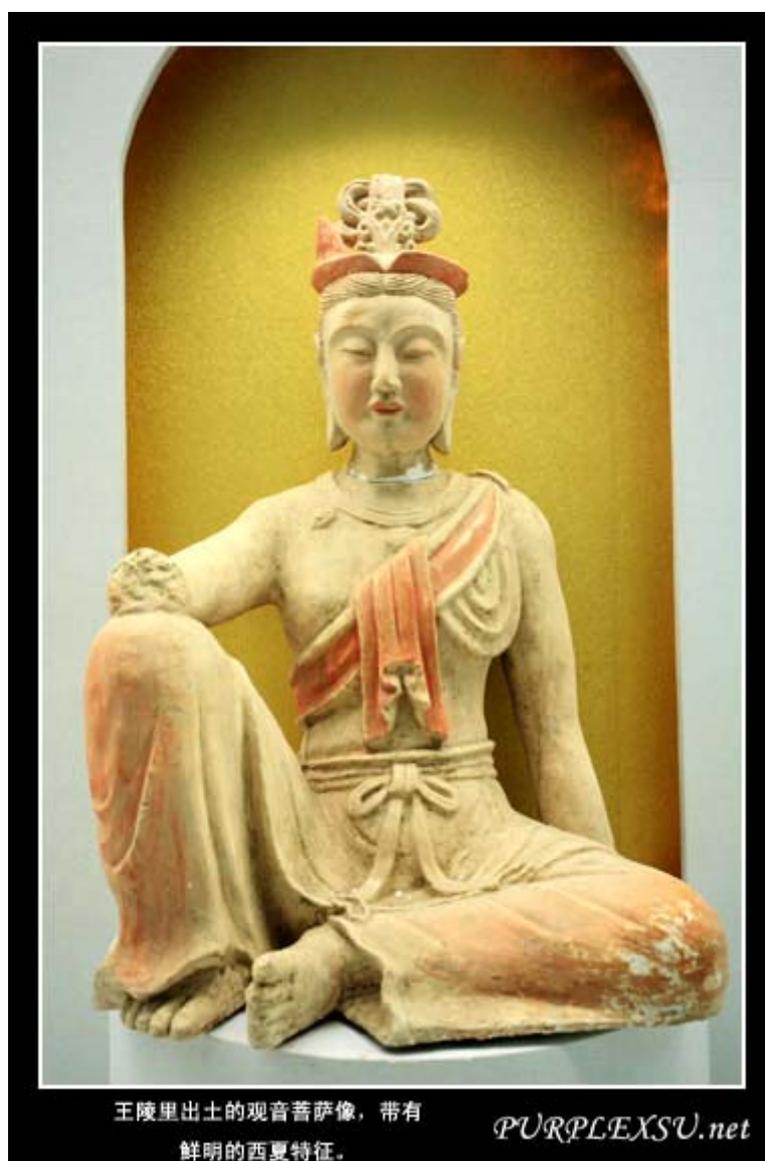
設立了中書、樞密二司，及御史台、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群牧司、飛龍苑、磨勘司、文思院等機構。元昊於立國的第二年再度改革官制，改宋二十四司為十六司，使西夏官制和機構已頗具規模。此後，西夏的官職和機構在中後期又有新變革，與前期相比有二點不同，一是職官和機構愈分愈細，二是前期的官制改革多屬政治軍事方面的，而中後期有關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官職有了明顯的增加。西夏時期大致設立了五種學校：蕃學、國學、小學、宮學、太學。西夏建立學校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培養人才的需要，尊孔子為文宣帝。西夏在中後期還發展科舉制度，大約于崇宗（1087-1139）後期開始設童子科實行科舉考試，西夏仁宗人慶四年（1147）策舉人，立唱名法，複設童子科。西夏後期基本以科舉取士選拔官吏，不論蕃漢及宗室貴族由科舉而進入仕途成為必然的途徑。西夏在實行科舉之後于天盛十三年（1161）正月仿唐宋制設立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無疑都是通過科舉進身授職的。

此外，西夏党項世代皇親宗室，欽慕漢族文明，崇儒尚文，編寫了一些融合和宣揚儒家學說的書籍，如《聖立義海》、《三才雜字》、《德行記》、《新集慈孝傳》、《新集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西夏儒學的發展是一種處在儒家影響下的官僚體制與政治文化。

西夏的思想與宗教。佛教是西夏的國教，建國前後六次向宋求贖佛經，宋朝賜以《大藏經》。元昊在立國之初，便開始用西夏文翻譯佛經，歷時五十多年，共譯出大小乘佛經 820 部，3579 卷，它不僅滿足了西夏党項民族對佛教信仰的需求，而且是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的盛舉。

元昊在發展西夏佛教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建設大規模的寺廟。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建立規模宏大的佛教寺廟高臺寺，西夏著名的承天寺是諒祚母后沒藏

氏倡建，乾順天祐民安四年（1093）由皇帝、皇太后發願，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重修涼州感通塔及寺廟，第二年完工後立碑贊慶，這通碑就是保存至今的著名“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乾順時期另一個大規模的活動是在甘州建築臥佛寺。這個寺廟規模宏大，現仍可從保存至今的臥佛寺略見其當年的風采。西夏遍佈全境的寺廟可概括地分為興慶府—賀蘭山中心，甘州—涼州中心，敦煌—安西中心，以及黑水城中心。西夏官府制定法律保護所有的寺廟、殿宇、宗教建築、佛像及聖地，並施捨錢物，以為慶贊。



王陵里出土的观音菩萨像，带有鲜明的西夏特征。

PURPLEXSU.net

西夏政權大力提倡佛教的政策，提高了佛教寺廟和僧人的社會地位。西夏的僧人

是一個不勞而獲的階層。他們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權，僧人不負擔攤派的雜事，不納稅；僧人犯罪後，可以減免罪刑，可以用官品抵當，可以不受黥刑，寺院的环境亦要受到法律的保護，等等。由此不難看出西夏僧人的優厚待遇，同時也說明瞭西夏對佛教的重視程度。

西夏時期已有帝師之稱，修正了中國帝師之設始於元代的傳統看法，目前從新的文獻資料中發現的西夏的帝師不只是1位，而是至少有3位。西夏開始封設帝師，進一步抬高了佛教的地位，使王室和佛教領袖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增強了佛教領袖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在西夏除帝師以外，還有國師以及其他有高級職稱的僧人，他們是僧侶的上層，具有較高的學識威望，在推動西夏佛教發展方面有著核心和中堅的作用。西夏後期受藏傳佛教影響的趨勢日益增大。

農牧並重是西夏社會經濟的特色。境內河西隴右地區的興（今寧夏銀川）、靈（今靈武西南）、甘（今甘肅張掖北）、涼（今武威）等州，“地饒五穀，尤宜稻麥”，西夏重視水利建設，夏仁宗時期修訂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專設條文具體規定了水利灌溉事宜。西夏在農業生產中已普遍使用鐵制農具和牛耕，宋人認為“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為事，略與漢同。”

西夏境內的牧區主要分佈在夏（今陝西靖邊北白城子）、綏（今綏德）、銀（今米脂西北）、鹽（今寧夏鹽池北）、宥（今陝西定邊東）諸州，鄂爾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額濟納一帶的山地和沙漠草原地帶以及河西走廊地區的廣闊草原。西夏牧業的畜類，以羊、馬、駝、牛、驢、騾、豬、狗等為主。馬匹在牧業經濟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除用於軍事和生產外，還作為大宗商品同周邊進行貿易，又是對宋、遼、金的主要貢品。西夏境內所產的“党項馬”馳名當時。駱駝用作高原和沙漠地區的運輸工具，阿拉善和額濟納地區是主要養駝地區。羊、牛、豬、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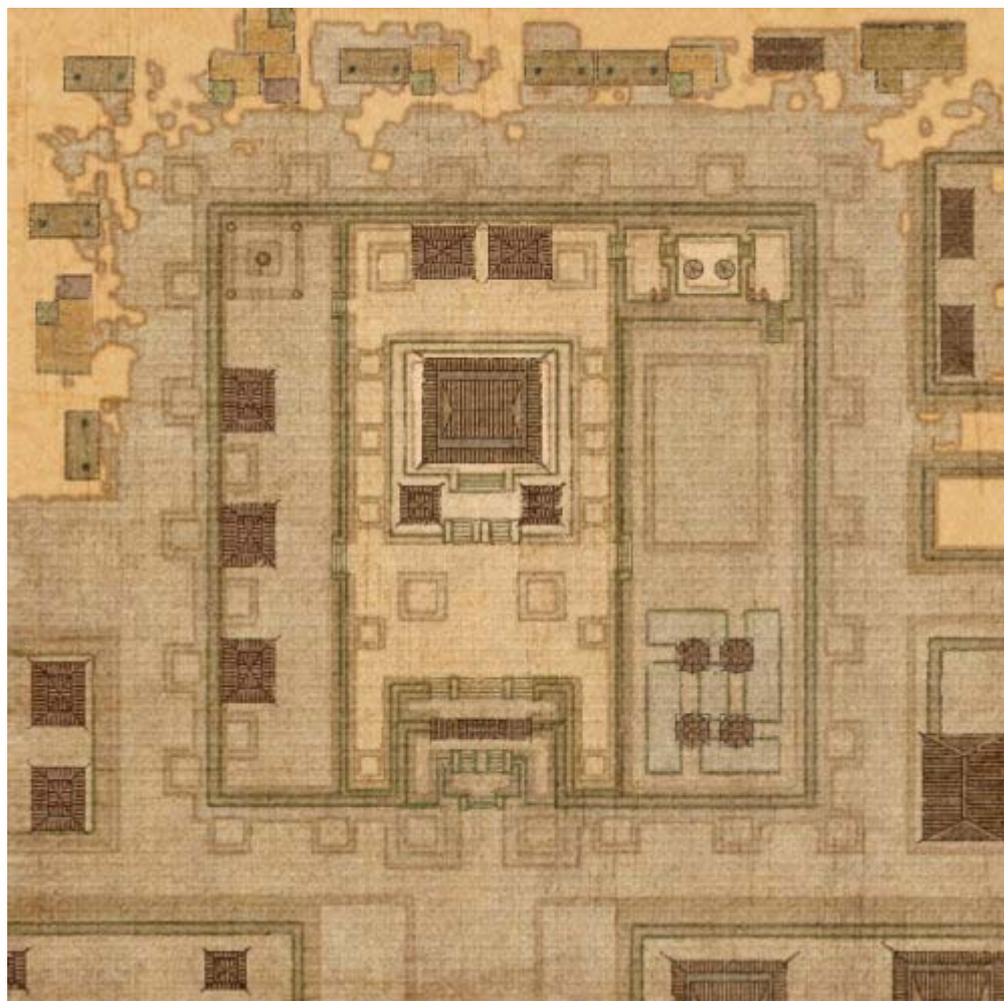
是西夏農牧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來源。党項族在長期從事畜牧業生產中，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反映在西夏時期編纂的辭書《文海》中，對牲畜的分類與觀察尤為細緻；特別是對馬、牛、羊品種的區分，對牲畜的管理、繁殖、飼養、疾病及治療等，都有獨特的方法與一套完善的經驗。

西夏的手工業門類也較齊全。夏仁宗天盛時期(1149—1169)修訂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門》中，規定設立的國家手工業管理機構，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絹織院、首飾院、鐵工院、木工院、造紙院、磚瓦院、出車院等。西夏較重要的手工業生產行業，有紡織、冶煉、金銀、木器製作、采鹽、釀造、陶瓷、建築、磚瓦等。西夏的兵器製造較為發達，“夏國劍”被宋人譽為天下第一。

西夏與宋、遼、金、回鶻、吐蕃等鄰國與民族都有頻繁的商業貿易往來關係，西夏在與宋、遼、金的邊境地帶設有共同使用的榷場進行和市，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貿易場地和牙人評定貨色等級，由雙方官府派遣的監督、稽查人員共同管理市場，徵收稅務。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1158)正式設立通濟監鑄錢。根據已發現的西夏錢幣，以夏景宗時所鑄漢文天授通寶錢為最早，以神宗時漢文光定元寶為最晚，西夏除獻宗、末主兩朝外，其他各朝都有鑄錢實例。

西夏的都城興慶府，天慶十二年(1205)改為中興府。據今存明代《寧夏城圖》，基本上保存了西夏興慶府城的輪廓和佈局，其城市“周回一十八餘里，東西倍於南北，相傳以為人形”。興慶府作為西夏都城，在城市建築上無不借鑒于唐都長安、宋都開封的規劃佈局。特別是在城市命名、都城事務管理機關、城門和街坊名稱上，都有直接淵源或借用之處。作為皇家統治與生活中心，有一定規模的宮城建築，宮室殿宇，官廳衙署，還有為皇家服務的手工業作坊及龐大的兵營和倉

庫。城西北建有避暑宮，西部賀蘭山東麓營建離宮、佛祖院、五臺山寺、皇帝陵園，城東 15 里的黃河岸畔建高臺寺及諸浮圖。興慶府是西夏最大的城市，是西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在國內處於十分重要地位。



西夏首都興慶府城平面圖

西夏的社會風俗，《遼史》卷一百十五，二國外記《西夏傳》云：  
其俗，……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擲筭，擲竹于地以求數，若撲著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為“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于背識之。仇解，用雞豬犬血和酒，貯于鬲中飲之，乃

誓曰：“若復報仇，谷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讎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為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西夏于 1227 年亡於蒙古。蒙元在滅亡和佔領西夏的過程中，西夏文化逐漸淡出歷史的視野。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西夏文化毀於戰火。西夏的頑強抵抗遭到蒙古的殘酷報復，中興府受到三次毀滅性打擊，府城內幾乎夷為平地，郊外一片荒原。在取得西征、南征，招降西藏的戰果之後，蒙古諸王為爭奪汗位又長期互相爭戰。河西遂成為爭奪汗位的戰場。為了逃避兵燹，西夏疆域內的原居民不斷遷往各地，形成規模相當大的移民潮，使西夏文化隨著民眾的逃亡而不斷散失。他們遷徙的範圍相當廣泛，見諸記載者就有中亞、尼泊爾、漠北、西藏、青海、四川、雲南、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山東、江浙等諸多地區。其中既有西夏國的統治民族——党項族人，也有其境內的其他各族人民，構成現今尚存的西夏遺民。二是民族大遷徙帶來的民族新格局的形成，直接導致了西夏文化的衰亡消失。蒙古不斷將征服的中亞、西域的穆斯林和南宋漢族居民，遷入西夏故地屯田耕作，注入伊斯蘭文化和漢文化。穆斯林不斷進入河西，出現了“元時，回回遍天下，居甘肅者多”的局面，西夏故地已成為回回聚集的地方了。自蒙古滅夏後，西夏文字已不再作為官方使用的文字，逐步被放棄使用。因為回回人的增多，代之而起的回回文字（阿拉伯文、波斯文）作為各族間文化經濟交流的文書在絲路驛站中流行。三是元朝人修史時，未給與遼宋金鼎立約二百年，幅員二萬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專史，只是依據遼宋金三朝舊國史編成分量不大的傳記，附於三部正史之中（《遼史》西夏外記一卷，《宋史》夏國傳二卷，《金史》西夏傳一卷），致使豐富的西夏歷史資料湮滅無聞。

直到 1908 年俄國人科茲洛夫在黑水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發掘大量的西夏文佛經、文獻和文物，西夏的歷史文化才又引起世人的關注。



黑水城遺跡

### 參考文獻

- 吳天墀：《西夏史稿》，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 史金波：《西夏社會》上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 杜建錄主編：《20 世紀西夏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 李華瑞：《論儒學與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10—13 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出版。